

# “中国意义”的丧失与战争责任伦理的解体

——评马场公彦著《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

刘建平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与当时中国舆论预想的“友好的新起点”、“新篇章”、“新阶段”大异其趣,中日关系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频发低幅振荡型周期性恶化,进入新世纪就迎来数年抵制首脑会晤的“靖国冰川期”;而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不仅使勉强作“偶遇交谈”的“准政治绝交”重演,更刺激出武力威慑姿态,把两国国民感情推向90%相互厌恶的高度对立。至少在目前,历史修正主义和领土民族主义共振已经破坏了中日关系缓和和周期复位的信心,陷入建设性沟通无能的“准断交”状态。

如何把握中日关系的原理并推动真正的相互理解?与中国依然常见“一小撮右翼分子破坏中日友好”之类的“文革”式大批判形成对照,日本学者在战后中日交涉的实证研究、中国研究的方法论反省、战争责任思想史和“历史认识”问题史建构、日本人中国观的“知识社会学”诸方面都取得重大成果,有的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日本人的战争观》、《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南京事件争论史》等。<sup>①</sup>2010年,马场公彦研究日本对华认识的著作《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出版,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文版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相信这部在日本获得了“大平正芳纪念奖”特别奖项、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的巨著,也会给中国学者带来别开生面的中日关系新知和学术方法论启示。<sup>②</sup>

—

在中国的日本论和中日关系论话语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日本被区分为敌对的军国主义分子、反动政府与友好的日本人民两个政治集合,而之后竟突然一体化,“二分论”让位于毫无意识形态矜持的“中日友好”。等到日本民意调查出现绝大多数厌恶中国、支持参拜靖国神社、拥护政府“国有化购岛”的状况时就难免进退失据,阶级分析想象的“人民友好论”或“一小撮右翼分子破坏”的新版“二分论”都失去事实前提和思想意义了。日本的民意调查对“人民伦理”构成一种反讽,貌似

<sup>①</sup> 吉田裕著,刘建平译:《日本人的战争观》,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子安宣邦著,赵京华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大沼保昭著,宋志勇译:《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笠原十九司著,罗萃萃等译:《南京事件争论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sup>②</sup> 该书2010年由日本新曜社出版,日文书名为「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2012年获得“大平正芳纪念奖”特别奖,《读卖新闻》等报刊刊载了多位学者撰写的书评。

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对中国的新冷战;但所谓“民意调查”不过是一种姑且的数据采集,它可以作为一时的论证根据或使其“舆论化”为政治利用工具,远非呈现复杂历史过程及其结构化现实的知识体系。《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敏锐地抓住“国民舆论已经成为推动日中关系的主要因素”这一当代问题意识,从战后黄金时期“论坛杂志”的大量评论文章中梳理日本的中国论,建构了基于历史过程逻辑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谱系”,使之成为自我反思和双方“相互理解”的知识参考。<sup>①</sup>

为什么“论坛杂志”的中国论可以作为梳理战后日本人中国观演变的资料?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科学的实证逻辑上明确日本国民“认识”中国的知识社会学概念和路径。作为知识的生产、流通过程,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是社会的知识信息来源,主要通过专业学术发行物传播到知识分子设定公共议题、形成社会舆论的论坛中枢,而公共知识分子在论坛上基于知识逻辑表达社会思想主见,其话语活动为一般国民阶层所接受。日本有大量商业模式运作的横跨学术、评论、报道的“论坛杂志”以及还兼顾文艺娱乐、社会话题内容的“综合杂志”,它们是具有“公共论坛”机能的媒介。这种“论坛杂志”基于知识分子、职业编辑、读者大众三者的关系编成,比报纸更适合作为“论坛”;它与知识分子的学术专业杂志不同,设定的读者对象是民意构成主体的大众乃至国民全体;与带有党派性的机关刊物不同,非特定于政党人群和压力团体,而要求开放性的言论活动。<sup>②</sup> 总之,从这种传播关系分析可以认定,在上述具有“公共论坛”机能的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论说,上流源于学术研究,下游深入国民意识,是可以把握的“日本人的中国观”实证。

《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以1945年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7年间的24种综合杂志上2554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为基本资料,所选取的杂志销量较大(1万册以上)、面向全国发行,并照顾到从左派到右派的各种主张、专业性与通俗性的读者层平衡。根据中日关系的历史阶段性,把日本“论坛杂志”的中国评论分为新中国建国初期、旧金山议和与中苏“和平攻势”、围绕中日恢复邦交问题的多种分歧、文化大革命对日本论坛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在日本社会的影响等五个特征性阶段。在对各阶段梳理的基础上,特别详细地分析了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主题的大量文本。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结论有两点:一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的认识分歧,在现实主义外交逻辑上讨论得失的“功利主义派”与主张承担战争责任、积极和解的“道义主义派”大致势均力敌;二是对中国本身蔑视的潮流公然涌现,为了回避赔偿义务而否认战争责任和侵略加害事实的“反华话语”开始席卷论坛。<sup>③</sup>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对于侵略战争反省和钓鱼岛问题坚持暧昧态度,原来有着两种对立主张相抗衡的舆论背景。其后正因为“暧昧”才一直纠缠不清并终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政治立场化的所谓“历史认识问题”,其实是战争责任问题。尤其作为中国的教训是:如果对日本国内的不同主张发生“阶级分析”的政治误解和意识形态误读,并据此向日本的“暧昧”外交妥协,结果就会造成战争责任的无责任处理局面。这种局面意味着“功利主义派”逃避战争责任的“国家利益”主张实现,而“道义主义派”承担战争责任必要性的预言落空,分裂的日本舆论就会经过民主主义原理向国家利益本能的民族主义转化、整合,形成所谓“新民族主义”主流。<sup>④</sup> 侵略战争受害国家对本国民众要求放弃战争责任追究的对日“友好”,有损于自身“民族国家”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而没有受到国际战争责任追究的事实则鼓励日本的民族主义,这种膨

① 馬場公彦「国交正常化までの論調探る」、『毎日新聞』夕刊、2011年1月6日。

② 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新曜社、2010年、27—33頁。

③ 馬場公彦「首脳外交から国民外交へ」、『毎日新聞』夕刊、2012年5月8日。

④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168—169頁。

胀的民族主义偏狭地主张所谓国家利益外交而蚕食、消解曾经存在过的“战争责任伦理”，否认战争责任的主张也就逐渐主流化了。对于这种为友好而妥协却求而不得的复杂过程，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薄弱，舆论就翻出几十年前的老调重弹而称之为“军国主义复活”，但日本并没有发生军部控制政府的事实，所以“军国主义复活论”批判不会被日本社会接受。而有了《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系统研究，就可以认识到那是日本“帝国精神”的复活，虽然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没有重演，但“战争责任伦理”的丧失就意味着与战前有历史精神连续性的立场复活了。

## 二

“帝国精神复活”的原理不仅具有国家利益本能的民族主义外交力学性质，而且有着自身知识生产和思想建构逻辑，《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就提供了这种触目惊心的社会思想演变知识谱系。

近代以来，日本存在着把侵华战争论证为“文明开化”对腐败落后之“圣战”这种极端主义的蔑视中国思想，中国研究的主流是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的“国策研究”型“支那学”。日本战败后，“国策研究”失去市场，“支那学”被作为“败者的话语”遭到否定而退出论坛。取而代之的登场的生力军是日本共产党及其支持者构成的“社会主义者亲华派”，其主要成员是侵华战争期间被俘后以延安为中心组织反战同盟的日本兵、延安工农学校的学员，他们回国后写下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纪实性文章；还有战时曾经在中国从事调查研究并参加过社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活跃家，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革命史观”出发，依据毛泽东思想向日本报道、评论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点说明中苏同质的中国国家形态，并试图与日本的人民革命相联系，倡导恢复对华外交，反对日美片面议和，向朦胧的邻邦寄托着经过战败、被占领之后回归国际社会的新日本国家想象。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缺乏直接报道渠道，日本论坛还大量翻译转载了美、欧记者的中国报道，多出自斯诺、史沫特莱等了解中共的专业作者，这在日本转变传统中国观而形成“新生大国”的新中国观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sup>①</sup>

憧憬革命的中国、寄托日本的未来想象是对中国的最大敬意，反对日美片面议和则表达着重建中日关系最基本的、把中国视为有人类平等尊严的国际主义“战争责任伦理”。岂料，1950年斯大林批判日共“和平革命论”而输出暴力革命纲领于先，赞助、鼓励朝鲜战争于后，“一边倒”向苏联的新中国也站在支持斯大林的立场行动，日共在国内遭到“整肃”并发生分裂，中国则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日共势力顿挫导致日本论坛上意识形态尊崇的玫瑰色中国观衰退，日本政府更以中共政权是受联合国谴责的“侵略者”、与苏联缔结有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支持日共企图暴力推翻日本宪法制度和现政权为口实，在美国操纵下拒绝与中国议和。与此同时，中国放弃新民主主义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日本论坛的中国观就越鲜明地呈现了赞否对立的局面。<sup>②</sup>

这种局面的构成，一方是基于“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而敌视社会主义中国、坚持日美安保体制、顾及台湾立场的反共反华派，一方是主张全面议和、反对日美安保体制、相信与社会主义共处的容共亲华派。而围绕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整风等政治运动还开始出现了普遍文明价值议题，有人指责为压迫自由人权，有人则从改造、教育新人的角度作出正面评价。但随着苏联揭露斯大林问题、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印边界战争爆发、试验核武器、日共与中共决裂、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震惊日本社会的中苏阵营内讧和中国政治经济破绽的出现，主观投

① 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403—404頁。

② 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172—174頁。

射型的理想主义中国论只剩下极少数崇拜毛泽东思想、幻想世界革命的“新左翼”活动家、理论家，而把中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客体观察型”中国论渐成主流。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由于“林彪事件”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中美秘密外交更反证了中国的世界革命意识形态虚脱，日本武斗派“新左翼”也因暴力活动遭到逮捕，作为“内在创造力源泉”投射着革命价值信念的中国认识就趋于衰竭。相应地，日本的中国“认识路径”开始整合归趋于“现代中国研究者”从事的“中国观察”，即“客体观察型”的现实主义中国论。<sup>①</sup>

“现代中国研究者”崛起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文革支持派”神化毛泽东、迷信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运动理论截然相反，他们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学、国内政治的权力斗争论分析政治过程和国际关系，指出中国的内政混乱、外交失败，既以“林彪事件”、中苏冲突、中美接近等有力事实压胜“文革支持派”于当时，更因后来中国也全面揭露文革浩劫、否定文革理论、实行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而不可置疑地确立了垄断性话语权。歌颂中国、歌颂毛泽东、歌颂文革的明显“谬误性”使理想主义中国观销声匿迹，而批判文革、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则传播了专制的、落后的、冷酷权谋的蔑视中国观。因此，作为日本内在价值的“中国意义”丧失，而完全变成一个日本的外交对象——并且是一个具有负面形象的外交对象了。

日本的“蔑视中国观”主流生成于中国文革破产、中美关系解冻时期，而中美关系解冻创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际政治机遇，美国也暗中推动日本与中国先行建交，所以日本思考中日关系所应有的“战争责任伦理”必然受到冲击。从《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统计分析来看：一方是集结于中间、右派杂志的坚持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立场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包括复交积极论、消极论、中间论、批判论；一方是集结于左派杂志的道义主义主张，其中又分为强调明确加害责任的伦理道义派和重视形式上完成对华战后处理、恢复中日邦交的政治道义派。虽然双方势均力敌各有100多篇的文章数量，但功利派中敌视、蔑视中国和完全否认加害责任的复交批判论高达53篇；而在道义派内部，着意于恢复中日邦交形式的政治道义派主张达67篇，占压倒性多数。<sup>②</sup> 总之，战争责任道义主张处于微弱的舆论地位，这意味着作为“战后议和”前提的“战争责任伦理”已经不能成立或者说解体了，日本外交可以依据“功利派”提供的一般性国家利益哲学与中国交涉，作出并不存在战败国与战胜国谈判议和的姿态——事实上也是如此，日本引导中国把“台湾问题”设定为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主题。而“战争责任伦理”缺位的邦交正常化必然是政治妥协的“假性议和”，中日关系在精神本质上不可能有“战后”的历史区隔——“帝国精神”依然健在，或者说已然复活。

### 三

中日邦交正常化欠缺“战后议和”本来必需的“战争责任伦理”，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在迟迟不能与中国议和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从对中国革命的理想幻灭到批判中国的蔑视性反华民族主义；《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日本社会思想史、国际传播学意义上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开拓通达、明确，为思考现实外交问题提供了知识根据。

作者指出：源于邦交正常化的“历史问题”，随着海湾战争以后日本兴起的“军事化国际贡献”讨论，更兼1995年发生“冲绳美军强暴少女事件”刺激的“日美同盟漂流”状况，呈现出新的局面。那种曾经驾驭了国民感情的“日中友好”精神和“首脑间正常化谈判”的经验法则已经失效，现在的

<sup>①</sup> 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422頁。

<sup>②</sup> 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392頁。

“历史问题”正是邦交正常化时期“功利派”与“道义派”两条逻辑合流的表征。<sup>①</sup> 很容易理解，“道义派”本来在日本国内就受到“媚中”、“反日”、“非国民”、“卖国贼”的政治压力，如果政府能够在外交谈判中更多地实现“功利派”的主张而获得“战争责任无责任化处理”的国家利益，“道义派”所主张的“战争责任伦理”就被证明是可以敷衍甚至亵渎的，那么他们能不黯然消沉从而导致社会舆论向“功利主义”整合吗？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舆论空间扩大，对于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认搁置钓鱼岛争议、向军事大国发展等日本“帝国精神”的社会存在化不能接受，空洞的“友好”说教和经验主义“首脑外交”不足以“管控敏感问题”，当然也不能驾驭国民感情了。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次生于美国操纵的意识形态冷战政治结构，所以它具有日美共同立场决定的顽强性。日本的“中国批判派”，在政治立场上分为坚持美国现代化价值观和日美安保政策的自由主义批判派与由于中日两国共产党决裂而负面评价毛泽东和中国内外政策的社会主义批判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歌颂派”总忏悔式地向“批判派”投降。<sup>②</sup> 因此，日本社会的中国论是一种被涂黑或抽空了的“意义空间”，其批判性是对抗性，而关联到战争责任问题则是蔑视性——一位以批判文革成名而领“现代中国研究”风骚的学者说：在中国听到讲述日本军队暴行的确受到震动，但正因为有幸不是战争时代的人，所以才能“客观地看中国”——没有牺牲于战争而是被文革之类的社会主义内乱夺去生命，岂不更是悲剧！<sup>③</sup> 这种“客观”中国论之所以为“蔑视性”，是因为其“比较悲剧”思维中隐去了中日关系本来应该存在的“战争责任伦理”。但无论如何，它在日本社会是有逻辑的存在。“自由主义批判派”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否认侵略战争事实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形式，而“社会主义批判派”如日本共产党人也主张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更何况“中国崛起”后被宣传为美日的共同威胁。中国的对日外交就是面临着这样根植于战后日本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历史修正主义”、“领土民族主义”、“中国威胁论”复合的“反华意识形态”性难题。

“日中友好欺骗与幻想的40年结束了！”这是在中国被斥为“一小撮右翼分子”代表的石原慎太郎操纵“购岛事变”之后，给2013年舆论热点专栏“火药库尖阁列岛”投稿的题目。他谴责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为“媚中外交”，蔑称中国利用贫困群居的毕业生“蚁族”和更加贫困而栖身于地下设施的农民工“鼠族”发起“反日暴动”并同时向钓鱼岛海域派船示威，呼吁“日本人保持不屈服于支那的觉悟”。<sup>④</sup> 多么明快的历史连续性！在近代史上，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中国观经历了从敬重到蔑视的转换；在战后历史上，日本对新中国的认识又重复了同样的转换。世界大战时代的蔑视曾经激发过中国人的强国梦，但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状况来看，克服蔑视中国观更需要中国更为深入的改革，那种以“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来诱人的“肥肉中国观”难免招来蔑视。马场公彦在介绍《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时谈道：日本要真挚地接受对战争责任和殖民统治反省不足的批判，中国也应该理解日本在战后总算勉强地维持了对外和平，中日关系从首脑外交转向国民外交，相信不懈的努力积累中能够产生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智慧。<sup>⑤</sup> 可以理解，国民主义才是公共理性的前提。

〔作者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马场公彦「首脳外交から国民外交へ」、『毎日新聞』夕刊、2012年5月8日。

② 加々美光行「鏡の中の日本と中国」、日本評論社、2007年、84頁。

③ 马场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606頁。

④ 石原慎太郎「日中友好『欺瞞』と『幻想』の40年は終わった」、『文芸春秋オピニオン 2013年の論点100』、株式会社文芸春秋、2013年1月1日、18—19頁。

⑤ 马场公彦「首脳外交から国民外交へ」、『毎日新聞』夕刊、2012年5月8日。